

知識份子，行動起來

◎ 張超

徐賁，《知識份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

「一旦理性思考與公共關懷合為一體，那些原本似乎只屬於有知識者的精英特徵也就會獲得普遍的公民社會，成為現代社會普通成員都可以具備的思想和行為特徵。」在《知識份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一書裏，作為一位身在海外的知名學者，徐賁先生之言可謂是對當下中國那些奉行犬儒哲學的「知識份子」的一個不失善意的忠告¹：

政治不是道德清談。政治是正義和倫理原則碰到現實問題的灰色地帶。知識份子介入政治，他們的責任就是在道德完美主義和功利政治之外，幫助並不完美的公共生活尋找自由與理性的支點。有人說，民主就像是渡人的木筏，看似簡陋的木筏雖然總很濕漉，但卻可以讓人安全地落腳，沒有沉船的危險。民主的政治也是如此。只有哪些不怕濕了腳的知識份子，才能上得民主政治的木筏。

在政治與正義之間，中國民族有其頗為源遠流長的引以為榮的歷史。早在2000多年前，「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籍此微言大義，中國知識份子開始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自我超越歷程。為了實現這種自我超越，即使面對劉徹的專制摧殘，司馬遷還是堅守了他的知識份子道德底線：忍辱負重，發憤著書，決不與世俗權威同流合污。

「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提及明末東林黨人的無畏抗爭時，余英時先生充分評價了他們的「講學議政的自由傳統」並指出，「凡此種種都是中國民主的精神憑藉，可以通過現代的法制結構而轉化為客觀存在的……上列種種精神憑藉，儘管遠不夠完備，卻已足為中國民主提供幾項重要的保證」²。這種精神，在當代中國，則體現在了北京大學老校長馬寅初面對一群蠻橫無理的人所發出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的豪言壯語之中。

當古雅典成為物欲橫流、勾心鬥角、信仰泯滅的墮落之邦時，蘇格拉底在廣場上大膽言說，要求雅典的青年人勇於體會一種體現道德和正義的生活，不要沉湎在世俗的誘惑之中。出於對自由言論的畏懼，雅典公民大會逮捕了他。在法庭上，蘇格拉底視死如歸，決然宣佈自己是一隻「牛虻」，「牛虻」就是要時刻叮著雅典城邦，讓它感到渾身不自在。在這裏，蘇格拉底揭示出了哲學家在民主政體中的使命，即現代人所說的「社會批判」。

蘇格拉底死後，倍感絕望的柏拉圖寫下了《理想國》，因為他要為雅典培育智慧的「哲學王」。在這個「哲學王」的治理下，理想國的人們過著體面而不失尊嚴的理性生活，「智慧」、「勇敢」、「節制」這三種美德體現在相對應的每一個公民身上，彼此承擔促進共同體穩定和強大的政治責任。當這個理想破滅後，柏拉圖不失時機地寫下了《法律篇》和《政

治篇》。他告訴大眾，理想中最佳制度是明智之士的絕對統治，而現實中最佳制度乃是法律之治和混合政制。古雅典知識份子的這種美德在西方的後人中得到了進一步的承繼和廣大，體現在哈貝馬斯「憲政愛國主義」主張裏，體現在阿倫特對極權邪惡與高尚政治的討論中，也體現在薩特這樣的左派學者對當時世俗政治的強烈抗議之中。

因此，無論古今中外，政治與正義都是知識份子的生死抉擇。然而，在另一方面，如果不被統治者重用，中國知識份子似乎天生就有一種鑽進「象牙塔」的習慣，當受到迫害時，則有一種自我流放的傾向。戰國時期的屈原即如此。即使是「上下而求索」和「哀民生之多艱」時，即使是寫下了千古名篇《離騷》，由於他沒有成為政治與正義之間的「擺渡人」，缺乏對政治權力的一種徹底批判，也很難稱得上是「知識份子」，所以一旦被奸佞諂諛、排擠時，他首先想到的是成為「芝蘭美草」。一旦國都淪陷，馬上就沉河於汨羅江，實在是靠政治太近的緣故。

知識份子全然不是這樣的，他獨立於一種意識形態的宏大話語之外，形成一種超然于現實政治的問題意識。他堅守自己的公民良知，但又不徹底與現實政治絕緣，成為一個隱居於終南山的「隱士」。知識份子不是「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陶淵明，更不是一有權力召喚便欣然出山的諸葛孔明。知識份子關注一個時代的重大政治和社會問題，他能夠堅持普遍的道德價值，同時又努力做到「日三省吾生」。換而言之，一個知識份子，在與權力保持適當距離之時，同時也要深刻認識到自身的局限性。

正如洛克在《人類理解論》中指出，理性是引導人走向的燈塔，但是人的理性就其本質而言乃是有限的。在筆者看來，這裏的「人」，不是特定時空下的人，而是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或者說，人類歷史上從未、將來也不會出現這麼一個人，他的理性可以達致無限，以至讓自己成為「哲學王」，成為世俗世界當然的統治者，蘇格拉底沒有，柏拉圖也沒有。這就意味著一個公民和學者，無時無刻都得對未知世界心存敬畏，也不能試圖去改造人性、建造一個「道德理想國」。這樣，經驗主義的政治哲學就引領徐賁先生承繼漢娜·阿倫特的道路，開始了其否定道德理想國和極權主義政治的一個心路歷程。

1949年以來的中國，知識份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整肅。從批判《武訓傳》和胡適思想，到一場「陽謀」引起的「引蛇出洞」，直到達到頂峰的十年文革……即使到了改革開放，反對「精神污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加之教育、學術長期依附于政治，知識份子失去獨立的經濟來源，整個文化教育界早已面目全非，可謂到處烏煙瘴氣。在這樣一個暴力與謊言盛行的極權主義時代，如果說出真話、拒絕謊言不僅意味著知識份子不可能從政治權力那裏拿到好處，而且還意味著將失去自己的工作 and 自由、蒙受各種各樣的苦難，那些自命為知識份子的人應該何以自置？

漢娜·阿倫特指出，在極權主義社會中，意識形態狂熱激起政治謊言，當知識份子運用經驗和常識去撥開謊言一層又一層的皮、試圖達到真相時，更多的有組織的、有系統的謊言就降臨在他的周圍。如果這還不夠，暴力就是最後的手段。謊言教人盲從，暴力則讓人感到恐怖。由此導致，在極權主義國家裏，不會有甚麼文學，不會有甚麼歷史，也不會有甚麼哲學，除非知識份子擁有足夠的道德勇氣，形成了張灝先生所雲的「烈士意識」。

世俗政治的合法性來源於哲學的論證，而不是來源於謊言，更不是來源於暴力。躲進書齋、逃避現實的零碎的考證無助於哲學家展開對世俗社會和政治國家的論證和批判，更何況是「不說假話」這一人倫道德底線居然已經成為這個時代好的知識份子的標準。在這裏，徐先生借用薩特的話指出，不要以為懂得了專業知識就是知識份子了，他們很有可能僅僅是魯迅

先生所言的「識字分子」。一位原子能科學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時不是知識份子，只有當他在反對核武器的抗議信上簽名的時候，他才無愧是一個真正的知識份子，因為他將自己的專業研究與「在具體公共問題上的社會批判」聯繫起來了。

在一個彰顯「自由、平等、人的尊嚴和理性」的現代社會中，所謂政治的正義性，誠如約翰·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所言，不能不涉及到多元價值的衝突和現代公民社會的抉擇。針對「現代性」這一「當今人們生存的基本處境」，徐賁指出：

在現代處境中，從某些現代價值（自由、平等、人的尊嚴和理性）出發，以其普遍性的價值來揭示和批判現代暴力和壓迫，這既是一種社會政治行為，也是一種知識政治行為。作為社會政治行為，這種批判是一種全民性的參與。作為知識政治行為，這種批判則是一種知識場域中的話語立場。知識場域中的話語立場不僅表現為學術理論取向，而且更表現為它所堅持的知識公共性。個人以公民的身份積極參與，這本身是對形形色色的冷漠、悲觀懷疑、犬儒主義、自我流放和精神向牙塔的否定。（序，頁3）

這五十年來的歷史，乃是中國大陸知識份子從整體上喪失了對公共事務發言的能力的歷史。如果以薩特的標準來看，這五十年來中國大陸幾乎沒有多少個真正的知識份子³。面對著五十多年來中國知識份子的深重災難和由此產生的種種「犬儒主義」的做法，徐先生指出，知識份子必須行動起來，大膽抗爭，恢復自己的公共色彩：

知識份子不輕易放棄說不的權利，但並不是隨時隨地都說不的人，他只是在需要時說不的人。關注時代的重大政治和社會問題，努力超越現有的意識形態限制，簡直普遍的道德價值，而同時對自身的限制保持清醒意識，這就是現代思想批判。它體現了明確的社會批判目的，拒絕將批判變成精緻而無目的的思想遊戲。在當今學術專門化，知識學院化，知識活動非政治化的社會環境中，精緻思想遊戲化的傾向正在削弱和瓦解思想批判的社會作用。（序，頁3）

薩特意義上的「知識份子」概念來源於啟蒙運動的故鄉——法國——一個充滿理性主義精神的國度。而比較我們的國家，由於歷史上很少有徹底的宗教救贖情懷，更由於頻仍的政治運動早已將中國文人的格與尊嚴摧殘得七零八落，聯想到2004年以來國內針對「南方人物周刊」這個雜誌所列舉的「影響中國」的公共知識份子「五十人」的種種詆毀來看，徐賁先生將這個全新的概念引入中國的知識體系中，可以說是相當及時的。

許紀霖先生高度評價了徐先生的政治哲學，指出徐先生雖然長期生活在美國，但是他的思考總是「有關中國最重要、最深刻的時代困境」，「他總是將中國的民族經驗，提升到普遍的人類困境中，分析個中的內在哲理」。古老的中國是我們唯一的祖國，面對著這個國家深重的民族災難和現代轉型中的時代困境，面對著棲息於土地上十幾億仍在輾轉恹恹的苦難人，相對他人理應更有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到底應該做些甚麼呢？

針對公民文化的中國本土建設這個問題，在「東歐知識份子政治」一文裏，談及中國民族從極權主義政治、後極權主義政治到憲政民主政治轉變這個社會大變革中知識份子的作用時，徐賁先生做了一個更為精當的解說，他指出：

就像政治自由主義問題一直到二十世紀90年代才引起中國學界的注意一樣，極權主義也是一個被久久延遲了的問題。東歐知識份子帶給中國知識份子的，不只是一個後極權的概念，而更是一種自由意識，一種批判與自我批判的知識勇氣和睿智。（頁263）

東歐走過的路就是中國要走的路，東歐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中國的知識份子所正在從事的，正是東歐知識份子早已完成的事業。知識份子在當下中國的價值，如果用更為精湛的話說，就是：

行動起來，走哈維爾與米奇尼克之路。

註釋

- 1 徐賁，《知識份子——我的思想和我們的行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4月，封1。
- 2 余英時，〈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載《中國傳統思想的現代詮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年9月，頁23。
- 3 在80年代那個思想相對解放的時代，巴金老人寫下了《隨想錄》。不能說不說巴老的反省是真誠的，但是，這種反思的真誠，是否足以論證一個知識份子的道德高尚、甚至足以製造中國知識份子的最高形象？對此，我是持懷疑態度的，雖然我很尊重巴老。因為，如果巴老能享受此無上的榮耀，那以林昭為代表的一些仁人志士又該擺到哪裏去呢？

張 超 民工、不自由撰稿人

《二十一世紀》(<http://www.cuhk.edu.hk/ics/21c>)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八期 2006年3月31日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四十八期（2006年3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